

橋樑教會會議與 1997 後的香港教會

房志榮¹

本文訴說大陸宗教政策及香港教區領導人物的實際具體情況，以此推論出香港教會的樂觀前途。

今年（1997）6月25至27日，在香港聖神研究中心，開了橋樑教會第十四屆年會，這是去年在台南的十三屆年會中所決定的時間和地點。一年以前，尚不知香港的政局和民情會變得怎樣。現在會議開完了，一切進行的順利，參加的十幾位成員，台、港各六至七位，澳門兩位，都以平常心對待，深深感到信仰的安定力量，及「有天常作主，無地不爲家」²的真實性。

這次開會的，除了神父、修女和教友外，還有香港的陳日君及湯漢主教，高雄的林吉男主教。至於胡樞機，則參加了26日晚明愛餐廳的晚宴，談笑風生，心情愉快，對未來充滿信心。

會議中，聖神研究中心的執行秘書林瑞琪先生將其近作《半世紀徘徊：中共宗教政策與實施探討》贈送給與會者每人一本。這本一百四十多頁的小書，由聖神研究中心出版，而聖神研究中心據該書頁扉所言是：

「天主教香港教區屬下機構，成立於1980年，宗旨是協助教區當局對中國不斷轉變的情況作出回應，以及推

¹ 本文作者：房志榮神父，羅馬宗座聖經學院聖經學博士，前耶穌會中華省會長，在本神學院任教聖經課程數十年，並曾擔任院長職務多年，文字作品很多，涉及面很廣。

² 已故蔡石方神父引宋朝學人之名句。

動本地教友同普世教會，負起關心中國教會的使命。中心除剪存資料外，還負責推動關注中國教會的祈禱、反省、培育……事宜。中心主要出版物有《鼎》中英雙語雙月刊，內容以宗教及倫理為主，依梵二精神，展開國內外教會之間的交談，推動修好，促進共融合一。」

本年是聖神研究中心成立的第十七年，而《鼎》雙月刊下一期也將出到第 100 號。回顧一下，香港教會的許多抉擇和行動，的確是在聖神領導下穩步前進。現在不妨把上面提到的幾個因素貫串起來，作一綜合反省，期望聖神的風繼續吹拂，讓教會在香港的臨在，對大陸的精神文明、及對台灣的心靈改革，都能發生積極作用。

本此，下文將循三條路線作報導與反省：

- 一、《半世紀徘徊》一書所透露的中共政策；
- 二、香港天主教會當局迄今所有的表現；
- 三、九七後的香港教會何去何從？

一、《半世紀徘徊》一書所透露的中共政策

本書作者林瑞琪先生從 1983 年就在聖神研究中心服務。十幾年的磨練、大陸多次的旅遊、各地的不同會議、使他對中國的宗教問題有多層面的接觸，除在《鼎》上發表專文之外，他曾於 1994 年出過一本《誰主沉浮：中國天主教當代歷史反省》。如今這本探討中共宗教政策的《半世紀徘徊》更把握了重點，作出了「一個中國人和一個中國基督徒」³對「宗教無小事」⁴應有的回應和反省。

³ 見：林瑞琪，《半世紀徘徊：中共宗教政策與實施探討》（香港：聖神研究中心，1996 年出版），139 頁。

⁴ 葉小文語，見前書 96 頁。

1. 徘徊於「消滅」宗教與「承認」宗教之間：中共處理宗教問題一直猶豫不決。在中共的執政歷史中只有「統治政策」，沒有「宗教政策」。即使文字上有「宗教政策」的說法，也不過是為其「統治政策」服務而已。

「在 1978 年 11 月中共十一大三中全會舉行之前，三十年執政的歷史尚且只是原地踏步。因此，一直未有明確的宗教政策，就絕非意料之外的了。⁵」

「回顧中國共產黨的歷史，可以看出中共本身是一個欠缺自信心，時刻擔心亡黨亡國，充滿危機感的政權。⁶」

2. 以管理宗教代替宗教政策：管理宗教的有公安部，有宗教局，有國家安全法。在公安部內設有分管宗教的機關，顯然將宗教列為經常監管的對象。公安部的「主要職責」部分，仍未擺脫自 1949 年立國以來的「戰時心態」，如職責第三條「預測敵情」一句表示隨時有假想敵的出現。將處理敵情與處理國內治安的工作混在一起，使公安機構的權力過大，而產生擾民問題⁷。

宗教局即「國務院宗教事務局」。其主要職責共有十點，在公佈時第八、第九兩點從略。按作者林瑞琪推測，那應該是「在宗教界進行反滲透」及對「無神論」教育的推廣⁸。

國家安全法並非專門針對宗教界，然而政府面對宗教問題時，強調必須「配合政法部門，揭露和打擊披著宗教外衣的現行反革命活動、和其他刑事犯罪活動」。在中共的法律條文中，往往把「國家」、「社會主義制度」、「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」

⁵ 前書 15 頁。

⁶ 前書 20 頁。

⁷ 前書 29, 31 頁。

⁸ 前書 33~35 頁。

混爲一談，而《國家安全法》的條文有特別的寫法：提到境外對象時，包括「機構、組織和個人」，但提到境內對象，則只說「組織和個人」，好像境內機構沒有參加「危害國家安全活動」的可能。這當然是指國家機構，相對於非政府組織而言。因此國家安全法不以國家機構爲防範的對象。但事實上，過去危害國家的重大事件，如文化大革命或四人幫，都發生在國家機構內。可見國家安全法是國家機構作爲管制國內外的手段，而非國家整體安全的法律⁹。

「從整個『辦法』的條文看來，中國的宗教事務部門一方面要放寬『壓制』，同時卻要收緊『控制』。目標是置一切宗教活動於他們的管制之下。¹⁰」

3. 從政策與管理到適應：《國家安全法》是 1993 年 2 月 22 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通過，同日公佈實施。同年 11 月 7 日在〈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〉講話中，江澤民對宗教問題說了三句有分量的話：「一是全面、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宗教政策，二是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，三是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。」

三年後，宗教局局長葉小文於 1996 年 3 月發表了一篇〈講政策、講管理、講適應〉的文章，先在《人民日報》刊登，後轉載於同年的《中國天主教》、《天風》（基督教）、及《中國道教》。文中葉氏強調：「宗教事務工作是政治性、政策性、群眾性很強的工作，其中第一位的是政治性。¹¹」葉氏也說出「處理宗教事務之難，在於這類事端往往是『非對抗性矛盾和對抗性矛盾交織在一起，不明真相的群眾和別有用心的壞人攬

⁹ 前書 45~48 頁。

¹⁰ 前書 80 頁。

¹¹ 前書 92 頁。

和在一起』。¹²」

江澤民的三句話原來是以宗教工作幹部為主體，要他們去實施的，葉文卻把第三點「講適應」講給宗教人士聽，要他們去適應。如何適應呢？葉文總結時說：所謂「相適應」就是要求宗教事務在四個維護的範圍內活動（維護法律尊嚴、人民權益、民族團結、祖國統一），不能與之相衝突。這樣，宗教活動成了「四個維護」的附庸，與「四個維護」無關的宗教活動，勢將變成可有可無的次要事件¹³。「四個維護」也可以說是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行為準則¹⁴，不聽從的任何團體，或自我消失、或走到地下¹⁵。

二、香港天主教會當局迄今所有的表現

說「香港天主教會當局」，是說下面所說的各種表現多少是有代表性或官方的。說「迄今所有的表現」，是指自從 1984 年中英發表聯合聲明以來，最後這十幾年香港教會的一些具體措施¹⁶：如中英聯合聲明前四年，聖神研究中心的成立；1983 年積極參與台灣及東南亞華人教會的橋樑工作和歷屆會議；1989 年 5 月 14 日（聖神降臨節）胡振中樞機發表〈邁向光輝的十年〉牧函，談香港教區未來的牧靈方向；同年 7 月 11 日胡樞機致函全球主教，請他們關注「香港前途」及「越南難民」問題。

1990 年 10 月 7 日胡樞機發表牧函，勸信友積極參與 1991

¹² 前書 94~95 頁。

¹³ 前書 91~96 頁。

¹⁴ 前書 106 頁。

¹⁵ 前書 136 頁。

¹⁶ 見：《香港教區大事紀》《1997 年香港天主教手册》，535~548 頁。

年區議會、市政局／區域市政局、及立法局的直接選舉：有關的教區指引於 10 月 12 日公佈。

1995 年 6 月 4 日（聖神降臨節）：胡樞機就〈邁向光輝的十年〉牧函，發表〈中期報告及計劃書〉，以「傳揚福音、拓展天國」作為未來五年之牧民重點。

1996 年 6 、 7 月間，教區舉行一連串多層面的諮詢，探討的主題是：在接受「中英聯合聲明」及「基本法」的大前提下，信徒應否以個人身份，加入「香港特別行政區」的「推選委員會」。該委員會的職責為推舉香港特區首長行政長官人選，及選舉產生「臨時立法會」議員。

8 月 2 日，根據主流意見，教區決定信徒（教友或神職人員）可出任「推選委員會」議員，但教區期望被委任的信友只參與推舉特區首長人選，而對法理基礎備受爭議的「臨時立法會」，則應投棄權票。結果， 11 月 2 日，教區司鐸徐錦堯神父、及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會長姚秀卿女士獲任命為「香港特別行政區」之「推選委員會」委員。

較早，即 10 月 20 日，慈幼會會士陳日君神父、及湯漢副主教被任命為教區助理主教、及輔理主教。 12 月 9 日在香港主教座堂舉行晉牧典禮。

這次在香港開的橋樑教會年會，一如前文說過，胡樞機及陳、湯二位主教，各以自己不同的方式，都曾積極參與。由他們的分享、反省，及整個跟與會者的交往態度來看，他們互動互補，彼此很有默契。若用我們基本的信理「三位一體」的比喻來看，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對香港教區當局增加些了解。胡樞機像是「父」：他跟教區神父開玩笑時說自己是偷懶，等到認識他的神父不同意時，他轉過彎說，就說無為而治吧；其實這是我國儒道皆重視的大智若愚，正如孔子所說的：「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。天何言哉？」（《論語·陽貨》）

陳日君助理主教像「子」，發言的機會很多。我們在中英文的《公教報》、天亞社報導及其他報章雜誌中，常會看到他對訪問者所作的答覆，例如最近香港傳播媒體引述法新社報導，說及教廷對七一後的擔心，陳主教即刻予以澄清：說回歸後，我們繼續做回歸前的一切工作。「**基本法能否落實，也要看我們是否願意努力去促使它落實**」¹⁷。

至於把輔理主教湯漢比做「聖神」，是相當恰當的。聖神研究中心是他一手創立，十七年來他跟很多不同路線的人合作，他的秘密就是信任別人，會用各人之長。英文部分瑪利諾會的神父和修女甘心為他服務。中文方面，劉賽眉修女及目前的執行秘書林瑞琪都是得力的助手。湯主教跑過很多次大陸，對各地區的主教、神父、修女、教友蒐集很多第一手資料。因此，德、法、意、比利時，以及北美的許多關心大陸教會機構，都會到聖神研究中心來討教，或打聽消息。

這次香港橋樑教會年會給人的一個驚喜是，三位香港教區的在權人都能合作無間，態度上又能平易近人。他們深知香港的三十萬教友，近些年來所作的種種表現是可圈可點的。他們沒有理由不懷著信心看向未來。聽說港督彭定康（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）在告別天主教團體時也說過，他對香港教會的未來是樂觀的，因為香港教會有那麼多突出的平信徒，他們都是能挑大樑的人。

三、九七後的香港教會何去何從？

這個問題當然要讓香港教會自己去答覆。但以旁觀者的身份，以十分關心香港前途，尤其是教會未來的心態，來根據前兩段所說的作些猜測，想不致有什麼妨礙。

¹⁷ 見：《公教報》，1997年6月29日，第一版，〈要聞〉。

1. **由敵對到對話**：1948 年以前，中共佔領上海時，無論是羅馬教廷，或中國教會，都是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因為中共在華北的許多作為並不邀請人與之對話。另一方面，天主教經過梵二大公會議的洗禮，態度上有很大的改變，不再是「順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」，而是向所有的人開放，不但跟其他宗教，連跟無神論者也可以交談對話。

說到對話，香港的三位主教這些年來，可說受到相當多的磨練和訓練，結果是他們敢講，中共當局也肯聽。比如胡樞機就向北京反映過：「統戰部」的說法已經過時，大家和平相處，何戰之有？終於香港新華社的有關部門不稱統戰部，而稱「協調部」。又如樞機被請，不願跟別的宗教一同北上，而要自己組團，單獨拜訪，也受到他們的接納。

陳主教的一大特色，是會把中共的一些專有名詞賦以積極的和更完滿的意義。如統戰部說：「我們是要做朋友的」，陳主教更加上：「做朋友要廣結善緣，無所不包：跟香港人做朋友，跟地下教會的人做朋友，跟各國的人做朋友，也要跟梵蒂岡做朋友。」中共也知道梵蒂岡地小勢力大，但，是精神勢力，本來不該帶給人任何威脅。弄到最後，他們只好說：「對你們所說的話，我們還要慢慢消化。」這種對話的氣氛，的確是他處見不到的，在中國歷史上應算是一個很新的出發點。

2. **對聖神充滿信心，多向聖神祈禱**：求聖神不僅領導香港教會，也領導整個中國。胡樞機非常信賴聖神，可從他的許多重要抉擇和牧函都選聖神降臨節公佈看出。在與他個別談話中也可感覺到，他去大陸訪問，他接見重要人物，都在祈求聖神的光照中而獲得信心。一次如此，二次如此，慢慢學會在聖神領導下生活、行動、工作、交往。

至於湯主教，可說一直與聖神結上不解之緣，先是聖神修院，後是聖神研究中心。這十七年的摸索，多次須進入無先例

可循的境況，但終於一步步走出一個工作模式，擬出一些與各界交往的規範。這種摸索前進，不但自己能站穩，還能給別人帶路的成果，絕非偶然。其中聖神之風的吹拂，人一方面的虛心合作，以祈禱陪伴行動都是可以想見的。香港回歸後的一年（1998）是二千年大禧年的聖神年，正配合香港教會的需要。

3. 與亞洲各地教會保持緊密連繫，與世界大公教會互通聲息：香港作為一個世界港口、金融和貿易中心，這一點不難做到。只是教會應有其特色，殖民時代未能做到的，今後也許更有可能實現。這就要看香港回歸的這個祖國是否充滿善意，讓這個以精神價值為第一的香港天主教會盡量發揮其所長，帶動全民的精神革新。